

1555 年洛迦諾難民與絲綢業的誕生——概述與 總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555 年 3 月 3 日，一隊男女老少離開了馬焦雷湖北端的小集鎮洛迦諾，拋下了房屋、葡萄園、家族墓地，以及他們的祖先曾參與治理了三個世紀的一方領地。他們是該鎮改革宗會眾的成員，在他們的宗主——瑞士聯邦各州——讓他們在棄信與流亡之間作出選擇之後，他們拒絕迴歸天主教信仰。兩個多月後，第一批人抵達蘇黎世。這群人中有 Muralto、Orelli、Duno、Zanino 和 Appiani 等姓氏，這些姓氏以德語化的形式 Muralt 和 Orelli，至今仍出現在蘇黎世各基金會的理事會中、行會的成員名冊上，以及該市金融機構的合夥人和董事之列。¹

這一事件在蘇黎世的自我認知中佔有特殊地位。蘇黎世將其講述為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規模不大、由行會治理、外表樸素的改革宗共和國，通過一次信仰上的團結之舉，獲得了一批商人家族，他們為它打開了通往意大利的市場，並教會了它如何組織紡織生產。這些家族為絲綢業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三百年後，絲綢業使蘇黎世成為歐洲兩大絲綢中心之一。這一敘事具有強烈的道德感召力。它將慈運理和布林格的宗教改革（見第 B.I 至 B.III 章）與城市的商業崛起聯繫起來，似乎表明對受迫害的外來者的開放以繁榮作為回報。歷史學家早已認識到，現實要複雜得多。洛迦諾人

受到了慈善的接待，也受到了猜疑；獲得了庇護，卻被拒絕授予公民權。他們引入了新技術，卻被行會阻止加以利用。他們中最早的幾位企業家有好幾位最終陷入貧困，而蘇黎世本地出生的商人卻收穫了他們播下的果實。²

對於一本關於蘇黎世作為金融中心的書而言，洛迦諾難民之所以重要，有三個原因。第一，這是蘇黎世大規模吸納外國商業資本和專門知識最早的、有充分文獻記載的案例。蘇黎世接納他們的條件（勉強、附帶條件、經由行會過濾，但最終對堅持下來的家族頗為慷慨）確立了一種在後來幾個世紀中反覆出現的模式，直至現代關於接納外國銀行和專業人士的爭論。第二，1555 年抵達的家族及其合作伙伴在隨後兩個世紀中成為商人顯貴階層的核心，他們的商號從絲綢貿易轉向票據貼現和管理他人資金。從 Aloisio Orelli 於 1557 年開設的店鋪，到直至 1973 年才被併購的私人銀行 “Orelli im Thalhof”，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第三，洛迦諾人為與日內瓦規模大得多的意大利和法國難民群體（Refuge）進行比較提供了天然的參照點，姊妹卷對後者有詳細論述。這樣的比較有助於揭示兩座改革宗城市不同的制度文化。³

本章按時間順序並結合主題展開。首先敘述作為聯邦共同領地的洛迦諾及其新教社群的發展與鎮壓（I）。隨後追隨流亡者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蘇黎世，他們在那裡於 Bernardino Ochino 的帶領下組成了一個講意大利語的教會（II）。第三節考察這些家族以及他們融入當地的法律和政治條件（III）。第四節和第五節轉向經濟：與意大利的貿易聯繫、Evangelista Zanino 和 Werdmüller 兄弟的企業絲綢包買制（Verlag）及其產品，以及塑造了通往商人銀行業漫長道路的與行會的衝突（IV 和 V）。第六節將洛迦諾人與日內瓦難民群體進行比較，探討他們揭示了難民資本的哪些特點（VI），第七節則簡要展望 19 世紀的絲綢資本以及當今蘇黎世的這些家族（VII）。

1 註釋

1.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意大利語版，Rosanna Janke 和 Rodolfo Huber， “Locarno (comune)”，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2108/2022-12-20/>。HLS 記載，1555 年 3 月 3 日有一百多名洛迦諾人離開該鎮前往蘇黎世。
2. HLS，意大利語版，Liliane Mottu-Weber， “Seta”，2020 年 9 月 16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3965/>。Mottu-Weber 指出，洛迦諾絲綢工人起初受到遲疑的接待，很快便被本地商人取代，後者建立了 Florhof 和 Seidenhof 等大型企業。
3. Martha von Castelberg Stiftung， “Familie von Orelli”， <https://www.mvc-stiftung.ch/leben/umfeld/familie-von-orelli/>。該基金會的家族史描述了 “Pestalozzi im Thalhof” 商號從絲綢貿易向私人銀行業的演變，以及其自 1891 年起以 “Orelli im Thalhof” 之名延續，直至 1973 年被 Bank A. Sarasin & Cie. 收購。

2 結論

1555 年改革宗信徒被逐出洛迦諾，是舊聯邦憲制結構的產物。作為由天主教佔多數的十二個州共同統治的共同領地，洛迦諾無法追隨蘇黎世進行宗教改革，在 1554 年的數次聯邦議會之後，其新教少數派不得不在棄信與流亡之間作出選擇。約一百至兩百人選擇了流亡。他們於 1555 年春翻越聖貝納迪諾山口，在蘇黎世找到了一座城市：它以同信者的身份接納了他們，給了他們一座教堂和一位著名的牧師 Bernardino Ochino，然而在短短幾年內，又將他們限制於進口貿易，解散了他們的會眾，並拒絕授予他們公民權。

難民的經濟成就必須放在這些約束下加以衡量。Aloisio Orelli、Lorenzo Pebbia 以及 Ronco 公司的合夥人等人開闢了通往貝加莫和威尼斯的新商路，在米蘭和威尼斯的宗教禁運中保持貨物流通，並引入了蘇黎世法律此前所禁止的合夥形式。Evangelista Zanino 建

立了德語瑞士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集絲綢捻絲、天鵝絨織造、染色和包買制於一體，卻因資本不足、投機和當局的敵意而破產。Werdmüller 兄弟與洛迦諾人 Dunus 和盧卡人 Turrettini 合夥，將他的理念轉化為 Seidenhof 和一傢俱有歐洲影響力的絹絲企業。

難民家族本身花了一個多世紀才獲得完全的公民平等。一旦獲得，他們便成為統治蘇黎世直至 1798 年的商人顯貴階層的一部分，其貿易商號逐步發展為私人銀行。從 Aloisio Orelli 的店鋪到 Thalhof 銀行，從 Giovanni Muralto 的外科診所到 Hans Conrad von Muralto 在創立 Bank in Zürich 中所發揮的作用，這是將宗教改革時期的城市與現代金融中心連接起來的線索之一。洛迦諾事件還展現了蘇黎世對待外國資本的一些經久不衰的特點：原則上開放，實踐中審慎，以證明有用為接納條件，並願意融合那些堅持到底的人。與日內瓦相比——其難民群體規模大出數倍，並在一代人之內改變了這座城市——蘇黎世以自己的條件緩慢地吸納難民，從長遠看，將他們的技能轉化為自己的產業和金融文化。

3 五句話概要

1. 1555 年，洛迦諾——由天主教佔多數的十二個州共同統治的共同領地——的改革宗社群被巴登聯邦議會強迫在棄信與流亡之間作出選擇，其成員中有一百至兩百人翻越聖貝納迪諾山口前往蘇黎世。
2. 蘇黎世以同信者的身份接納了他們，並在 1563 年以前為他們提供了一座由 Bernardino Ochino 主持的意大利語教會，但將他們限制於進口貿易，將其排除在行會之外，僅在例外情況下授予公民權：Muralto 家族於 1566 年，Zanino 家族於 1567 年，而 Orelli 家族直到 1679 年才獲得完全的公民權。

3. 難民開闢了通往貝加莫、威尼斯和里昂的新商路，引入了合夥形式和包買制下的生產組織，並在 Evangelista Zanino 身上造就了德語瑞士第一位大型紡織企業家。
4. 蘇黎世商人，尤其是與 Dunus 和 Turrettini 合夥的 Werdmüller 兄弟，在 Seidenhof 和絹絲貿易中接手並擴展了難民的技術，為一個在 19 世紀使蘇黎世躋身世界領先絲綢中心之列的產業奠定了基礎。
5. 洛迦諾人的後裔與 Pestalozzi 等聯姻家族一道躋身商人顯貴階層，並從絲綢業轉向私人銀行業、印刷業和公共財政，留下了一份從 Thalhof 銀行和 Orell Füssli 延伸到 Bank in Zürich 以及今日城市公共記憶的遺產。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the-locarno-refugees-of-1555-and-the-birth-of-the-silk-industry-overview-and-sum